

〔美〕塔德·舒尔茨著

昨与今

战后世界的变迁

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東方出版社

昨 与 今

战后世界的变迁

〔美〕塔德·舒尔茨著

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

東 方 出 版 社

Then and Now

——How the World Has Changed

Since WW I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Inc. 1990

根据纽约威廉·莫洛公司 1990 年版译出

昨 与 今

Zuo Yu Jin

——战后世界的变迁

著者/[美] 塔德·舒尔茨

译者/中国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

封面设计/尹凤阁

发行/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时事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9.5 字数/467,000

版次/1991 年 1 月第 1 版 199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ISBN 7-5060-0230-2/K·57 定价 8.00 元

(内部发行)

6207/56

中译本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塔德·舒尔茨是美国的知名记者。从战后初期至今一直活跃在国际重大新闻现场，出版过好几本叙述战后重大事件和人物的速写性著作。近年来，他通过自己战后采访的实地记录和对战后历史的研究，写出了《昨与今——战后世界的变迁》，1990年在美国出版，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本书时间跨度是从1939年至1990年。作者认为这是“历史长河中变化最大、最快的历史时期”。作者从相互关系和前后演变中叙述重大的国际事件，描绘了一幅带有作者鲜明印记的脉络清晰的战后世界变迁图。书中描述了核时代阴影下冷战的开始和结束；世界两极格局的形成及其瓦解；美国在经历“黄金时代”后从世界主宰地位上跌落；西欧经济的恢复特别是德日经济力量的崛起；苏联内部的变化特别是东欧的剧变；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和第三世界的兴起及其内部的重重矛盾；以及人类面临的种种社会挑战和科技成就及其所带来的危险。作者的叙述还涉及到鲜为人知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原子讹诈和间谍战，以及音乐、美术、文学、电影、戏剧等文化领域。由于作者掌握的材料相当丰富，既有自己现场采访的第一手资料，以及他与各国领导人和战后舞台上各种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之间的谈话实录，还利用了新近解密的各种战后档案材料以及西方专家学者有关战后事件和人物的专著，这使该书成为一部内容丰富、视野开阔、文笔生动流畅的战后世界史。值得我们在研究战后世界史时参考。

但是必须指出，作者的资产阶级立场和观点渗透全书。作者对西方社会虽然有所批判，但这是“小骂大帮忙”；而对社会主义制度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作者在书中完全赞同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书中所表述的荒谬见解，即认为 20 世纪是社会主义从兴起到衰亡的世纪。因此作者既不会正确对待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重大成就，也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也有自我完善的过程。书中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成就往往一笔抹煞或匆匆带过，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某些领导人在建设中的某些挫折或暂时的错误却刻意渲染，无视社会主义中国在逆流中屹立和在改革中前进，极力宣扬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一时成功，颂扬所谓的“民主化”的进展。本书是一部反映西方流行学术观点的颇具代表性的战后世界史，我们译出主要供有关研究者参考，相信读者阅读时会加以鉴别，批判地对待。

另外，对书中某些段落，我们在编辑过程中，作了必要的删节。

参加本书翻译和校订的有王保存、刘小英、肖军、蔺寿东、彭澍、樊高月、赵要德、封长虹、裘小宇、王桂芹、王卫民、傅玢玢、俞敏洪、刘瑞祥、肖孝毛、叶祥根和石纯。全书由聂送来统校。

译文不妥之处，希望读者不吝指正。

前 言

正如我所尊敬的一个同事所说的那样，新闻记者的文章绘制了史书的第一份草图。

因此，本书记述了我这位新闻记者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所经历的、看到的、听到的和读到的事件，特别是重大事件。虽然我试图用历史的观点来描述我经历的事件，但我不想把本书写成一部学术性很强的历史著作。

1945年至今，我的职业始终是记者。我作为一名采访记者为《纽约时报》工作了近20年，以后便成为一名独立撰稿人。因此，我有幸走遍全世界。我不仅从华盛顿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新闻，还从68个国家发回消息。这68个国家分布在北美、中美、南美、东欧（包括苏联）、西欧、东亚（包括中国）、东南亚（包括越南）、南亚次大陆、中东、北非和南非。

我亲眼目睹了华盛顿政府的更迭和联合国的变迁，观察过在“马歇尔计划”的帮助下战后西欧各国的重建和尔后欧洲共同体的诞生和发展，看到过共产主义世界从兴起到衰亡的惊人变化，注视过巴西、印度、阿尔及利亚等第三世界国家获得独立的艰苦历程。我还从古巴、菲律宾、黎巴嫩等国报道过那里发生的革命、起义和暴动。

非常幸运的是，我亲身经历了20世纪下半叶发生的许多划时代事件，如越南战争，美国出兵古巴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团结工会的诞生、发展、衰败和最后胜利，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根本变化，1989 年秋马克思主义体制在东欧的突然崩溃，以及冷战的结束等。

我对高技术革命的发展及其所造成的影响，对医学、核能和航天等自然科学领域的伟大成就，一直予以密切注视。我虽然没有专攻过自然科学，但我的许多朋友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给了我很多帮助。此外，还有大量的出版物可为我所用。幸运的是，我有很多良师益友，他们深谙音乐、美术、文学、历史、通俗文化、电视和电影等。

我的工作使我有幸见到战后的一些伟大巨匠，如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总统、温斯顿·邱吉尔、夏尔·戴高乐、让·莫内、康拉德·阿登纳、安德列·维申斯基和安德烈·葛罗米柯等。

我还亲自会见了当代的其他名人泰斗，并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进行过采访，他们是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乔治·布什、亨利·基辛格、周恩来、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英迪拉·甘地、约瑟普·铁托、菲德尔·卡斯特罗、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穆罕默德·齐亚·哈克、弗朗索瓦·密特朗、迈克尔·罗卡尔、布顿恩·马尔罗尼、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安东尼奥·德奥利韦拉·萨拉查、马里奥·索雷斯、果尔达·梅厄、伊茨哈克·拉宾、哈伊姆·赫尔措格、亚西尔·阿拉法特、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莱赫·瓦文萨、保罗六世、约翰·保罗二世、胡安·庇隆、儒塞利诺·库比契克、奥斯卡·阿里亚斯·桑切斯、奥马尔·托里霍斯和国王希格门·辛耶·旺尊克等等。在回忆这些伟人的名字时，我感到荣幸和自豪。

我认为，战后的岁月是近代史上最激动人心、最令人迷恋、最使人震惊、最令人振奋的时期。毋庸置疑，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至今的这一时期在人类社会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长河中是变化

最大、最快的历史时期。

我有幸看到的这些变化，不仅发生在华盛顿、巴黎、伦敦、莫斯科等决策中心，美国和高技术开发生中心，以及北美和西欧的现代化医院；而且还发生在下述地点：圣保罗、墨西哥城、加尔各答和开罗的贫民区，当地居民乱砍、乱伐、乱烧原始雨林的亚马逊河流域，美国曾丢失4颗氢弹的西班牙南部，阿富汗、巴勒斯坦和尼加拉瓜的难民营，耶路撒冷、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南非的索韦托城，战时的西贡，实施市场经济改革后农民走上富裕之路的中国西部农村，革命的马埃斯特腊山区和哈瓦那，革命的波兰格但斯克，到处是饥民的印度农村和开伯尔山口，以及长期以来毫无变化的不丹王国的喜马拉雅山区。

我报道各国的内战与革命，以及令人痛恨的拉丁美洲各国独裁统治者被推翻的消息。我密切注视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暴乱、惨酷行为、突然发生的种族迫害和宗教斗争、饥饿与穷困、婴儿死亡率的上升和大肆侵犯人权的暴行。

但是，我也有机会看到人类对信念的忠诚、勇敢、创造力、忍耐力、牺牲精神、乐观情绪和感人至深的至诚至爱。我还注意到人们不惜任何代价追求自由和民主的顽强意志，坚持要求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决心。

总而言之，我作为一名记者和美国公民对未来持乐观态度，尽管我知道，要达到我们的全部目标，要经历千难万险，决非一朝一夕之功；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必然有失意和痛苦、失败和挫折。难道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求助于朋友和先是陌生人后来才成为朋友的人。他们对我帮助很大，使我对当今世界上的各种问题和各种问题之间的细微差异有了清楚的认识。很多人拿出宝

贵的时间与我推心置腹地进行交谈。我对他们，尤其是下述人士感激之至：

在政治学、历史学和意识形态领域，有在伦敦的艾赛亚·柏林爵士，在芝加哥的莱谢克·科瓦科夫斯基，在巴黎的米歇尔·罗卡尔总理、弗朗索瓦·菲雷、米歇尔·若贝尔和雷吉斯·德布雷，在华盛顿的伊曼纽尔·德马杰里，在赫尔辛基的芬兰总统毛诺·科伊维斯托，在圣约瑟的哥斯达黎加总统阿里亚斯，在伊斯兰堡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萨哈布扎达·雅各布·汗，在耶路撒冷的以色列总统哈伊姆·赫尔措格，在突尼斯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亚西尔·阿拉法特，在华沙的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米奇斯瓦夫·拉科夫斯基、布罗尼斯瓦夫·格雷梅克、亚当·米赫尼克和已故的埃德蒙·扬·奥斯曼奇克，在格但斯克的莱赫·瓦文萨，在波尔多雅克·沙邦—戴尔马，在莫斯科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谢尔盖·米高扬，在哈瓦那的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和非德尔·卡斯特罗，在华盛顿的丹尼尔·戴维森和已故的简·维克托·姆拉德克。我的同事和朋友有《纽约时报》的弗洛拉·刘易斯和卡尔·迈耶、巴黎《世界报》的米歇尔·塔蒂与洛杉矶的斯坦利·希恩鲍姆。

在人类生存条件领域，有在华盛顿的国家科学院医学研究所所长塞缪尔·蒂尔博士以及艾尔弗雷德·贝尔和约瑟夫·弗莱明博士，华盛顿人口研究所所长维尔纳·福尔诺斯，华盛顿国际特赦协会的帕特·伦格莱，纽约人权监视组织的阿里耶·尼尔，在华盛顿的马乔里·索南费尔特、理查德·希夫特、马克·施奈德和艾尔弗雷德·埃德尔森，纽约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詹姆斯·格兰特，新德里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的拉齐亚·伊斯梅尔，华盛顿国家医疗中心主任罗伯特·道格拉斯，以及在华盛顿的威廉·卡曾斯博士。

在音乐和文学领域，有在纽约的拜伦·贾尼斯和史蒂夫·沃瑟曼，在华盛顿的亨利·雷蒙德，在墨西哥城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卡洛斯·富恩特斯和已故的恩里克·谢林等。

在本书的参考文献目录中，我列出了我参考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作者，它们是我最重要的材料来源。除了出于谨慎的原因要求我不要披露他们的姓名外，我对参与本世纪下半叶那些伟大事件的、向我直接提供情况的人，都做了清楚的说明，他们都是政治家、军事领导人、科学家、国务活动家、思想家或经济学家等。80年代末，我又访问了波兰和苏联，这使我通过与现在已敢于讲话、且具有丰富知识的男女公民的谈话，得以了解到那里过去和现在的许多新情况。我得到了许多新信息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波兰和苏联新闻自由之风越吹越盛。当然，我的另一个极其重要的信息来源是报纸刊物，如美国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杂志》、《洛杉矶时报》、《时代》周刊、《新闻周刊》、《外交政策》和《外交事务》杂志，法国的《世界报》、《快报》、《问题》周刊，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等。我的结论性意见是，在这部史书草稿中，即使在每章的后面加进详尽的、徒有其名的注释，读者也不会得到多大益处。因此，我未做注解，以免给读者造成负担。

本书之所以得以问世，还由于我多次出国采访，派我出国的美国重要出版物的编辑都是我的朋友，如在纽约出版的《行列》周刊的编辑沃尔特·安德森，在华盛顿出版的《全国地理杂志》的编辑威尔伯·加勒特和查尔斯·麦凯里，在华盛顿出版的《外交政策》杂志的编辑查尔斯·威廉·梅恩斯，《洛杉矶时报》的《意见》专栏编辑奥瑟·塞登伯恩，《洛杉矶时报》报业辛迪加总裁杰西·莱文，以及在纽约出版的《屋檐》杂志国际版总编皮特·布洛克等。对他们，我表示衷心的感谢。

一如既往，我的妻子——玛丽安娜，通读、校对和编辑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此外，她还常年地帮助我搜集素材，进行耐心的和富有创造性的分析研究。像往常一样，我也要对她表示感谢。

本书从开始写作到出版历时3年之久。在此期间，威廉·莫罗出版公司的编辑、本书的责任编辑利萨·德鲁给了我很大鼓励和帮助。我的版权代理人和朋友——莫顿·扬科洛和安妮·西鲍尔德——为本书的按时出版作出了特殊的贡献。对他们，我也不胜感激。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序幕	1
第二章 一九四五年	46
第三章 四十年代	96
第四章 五十年代	168
第五章 六十年代	274
第六章 七十年代	380
第七章 八十年代	491

第一章

序 幕

在 1939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这令人心旷神怡的夏末的一天，割下来的庄稼散发出的清香气息慢慢飘过欧洲的田野。就是这一天成了 20 世纪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

这一天拂晓 4 点 45 分整，在德国空军的俯冲轰炸机攻击华沙和其他波兰城市的同时，德国陆军的装甲师从西、北、南三个方向，对波兰实施全面入侵。这就是希特勒的“白色作战行动”。这次进攻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这次战争将持续 6 年，造成 6000 万人死亡（其中三分之二是老百姓），并从根本上改变世界人民的生活观念。

这次战争直接和间接地引发了人类社会的根本变化，引发了科学技术、人的智力和政治方面的飞速发展与进步。在本世纪下半叶，这种发展势头不仅得以继续保持，而且其速度还有增无减。假如没有这次战争在大西洋两岸（主要是美国、英国和德国）所导致的人类聪明才智前所未有的充分发挥和物资、财政资源前所未有的充分开发，发生如此巨大的变革（或即使是发生小一点规模的变革）是根本不可能的。归根结底，同盟国的胜利是民主国

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力量对在欧洲和太平洋地区敌国的胜利，是核武器、空中优势和大量生产的装甲车辆、科技情报手段和惊人的医术新突破的胜利。它们是同盟国军民做出的巨大努力和英勇牺牲的有益补充。西方盟军和苏联红军总共牺牲了几百万官兵。

同时，这也是士气、信仰和领导艺术的胜利。

毫无疑问，战时为在科学和医学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而进行的研究，主要是为了取得军事优势。为了在战场上取得主动权，各同盟国和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科技发明方面几乎毫无建树）实施了许多旨在研制先进武器的、宏伟的应急计划。

奇怪的是，这些研究战前在各国几乎都刚刚进入理论探索阶段。1938年，在柏林的德国科学家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原子裂变试验，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只是由于缺少资金，才未能取得更大进展。然而，由于事关战争的胜负，各国都集中了大量资源和科学家，用以研究和生产从原子弹到青霉素，从雷达、火箭、喷气发动机和塑料到抗菌素、抗疟药和康复用外科手术器械的一切物品。

新技术发展的列车一旦启动，其运行速度便越来越快。由于政府和私人企业现已大量提供科研经费，一场惊心动魄的科技革命突然发生了，在规模上只有19世纪的工业革命可与之媲美。战时的科技发明和尔后的国防科研成果转为民用以后，使我们拥有了工业核电站、核医术、激光医疗器材、器官移植技术，以及不可思议的半导体收音机、电子计算机、载人航天器、卫星通信器材、使地球变小的喷气式客机、遗传工程和人工智能技术。科学的大门已经打开，我们正向未知的领域快速进军。此外，我们还有幸得到了圆珠笔（邱吉尔和飞机机组人员很快发现，自来水笔在高空漏水）和可涂在厨房用具表层的聚四氟乙烯（这种材料是芝加哥大学在建造世界第一座原子反应堆时发明的）。最后一点

是，到 21 世纪肯定会占统治地位的信息社会出现了，信息社会无疑会代替工业社会，知识工人无疑会取代蓝领工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和德国，这两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科学技术打败的国家，却正在向高技术强国迈进，因而也在进行科技复仇。它们在全世界争夺商品市场，使国际经济秩序正向着有利于它们的方向变化。例如，日本从 1950 年至 1980 年花了 100 亿美元购买西方的技术，用以改造本国的工业。到 1990 年，日本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银行和很大一部分美国娱乐产业。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还爆发了伟大的政治运动。1914—1918 年的战争又称为“伟大战争”。与此次战争不同，1939—1945 年的战争破坏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传统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俄国在 1917 年的失败为十月革命的胜利和共产主义制度在以后所谓的苏联的建立铺平了道路。但是，共产主义并没有冲出苏联的边界。另一方面，1945 年，随着起征服作用的苏联军队的到来，马克思列宁主义却吞没了东欧，并似乎要扩散到西欧和初生的第三世界。在战后的若干年里，很多人，特别是渴望民族解放、民族独立和社会公正的不发达地区的千百万人民认为，未来的世界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这又导致了席卷世界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无数次的民族革命。

但是，如果说从许多方面看，战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影响的扩大，都是令世人震惊的话，那么，在 80 年代末，它作为 20 世纪一支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政治力量的突然衰亡，也是触目惊心的。的确，1989 年是共产主义时代寿终正寝的一年。在这一年的秋天，东欧各国和很大一部分苏联人民（特别是苏联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人民），令人难以置信地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残酷的、骗人的，它以服务于人民之名行骗人之实。在所有的苏联前卫星国，共产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丧失了统治权。1990 年

2月，苏联共产党自动放弃了执政垄断权，正式向马克思列宁主义时代告别。显然，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他是苏联战后第一代领导人）领导的苏联人之所以抛弃了正统的共产主义，其根本原因就是他们有了上述认识。这种认识还是中国的共产主义制度发生震惊世界的大动荡的主要原因。在西方人看来，“欧洲共产主义”的危险已是明日黄花。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兴起和衰亡，是战后历史上的两大里程碑。第一个里程碑的竖立标志着冷战的开始，45年后第二个里程碑的出现预示着冷战的结束。

非殖民化是同盟国在维护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必然结果。在非殖民化过程中，有近100个亚洲、非洲、中东和加勒比海国家获得了新生。但是，伴随它们新生的剧痛却在短时间难以消失。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第三世界国家依然十分贫困，不断发生危机。近年来，那里的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是在日益提高，而是在不断下降。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1989年有13亿人（占世界总人口的20%以上）严重营养不良或重病在身，其中5亿人在南亚和东亚。在非洲，每个人的平均年收入为450美元。1989年世界银行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称，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人的收入在80年代实际上在不断下降，那里的人民几乎像30年前一样贫穷。新独立的国家得到了自由，但没摆脱贫困，民主对它们来说依然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在战争将近结束时成立了联合国，以确保和平得到维护。世界和平已经持续了45年，比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和平期的两倍还长。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国际金融机构，帮助被战争破坏的国家重建家园和恢复经济。在西欧各国、美国和部分亚洲国家，经济开始繁荣起来，出现了新的中产阶级及其生活方式。到80年代末，民主化倾向愈演愈烈，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极右独裁政权则步履维

艰。与此同时，学术思想、文化、艺术空前繁荣，越来越多的人可以接触到各种文学作品、音乐和哲学思想，并到古代和近代博物馆参观名画和雕塑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以后的事件，把美国塑造成了一个具有新文化的新国家。根据《士兵权利法》，有将近 800 万退伍军人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另有几百万复员官兵得到了住房贷款和享受公费医疗。这场战争还使美国有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他们不仅有钱购买消费品和在市郊居住，还十分关心社会的利益。“大萧条”的阴影烟消云散了。穿军装的美国公民在海外看到了两大洋彼岸的世界；孤立主义不会再有市场了，美国准备帮助被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国家（甚至包括敌国）重建家园。

上帝保佑，在战后最初的几十年里，世界上出现了许多有胆有识的领导人。美国战后的第一任和第二任总统哈里·杜鲁门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及军事活动家和杰出的和平时期思想家乔治·马歇尔，就属这一类人。他们对本世纪后半叶世界事务具有举足轻重和毋庸置疑的影响。

温斯顿·邱吉尔、法国的让·莫内和罗贝尔·舒曼、德国的康拉德·阿登纳，首先想到了要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这个统一的欧洲就是现在的欧洲共同市场，到 1993 年 1 月 1 日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集团。夏尔·戴高乐在法国遭受几代人的失败和屈辱后，恢复了法国人的自信心。美国在东京的最高长官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广岛、长崎被原子弹夷为平地和东京遭受大规模轰炸后，为日本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奠定了基础。巴西总统儒塞利诺·库比契克是拉丁美洲最伟大的幻想家，他在他的广袤千里的国土的中心建设了新首都——巴西利亚，自从 1500 年葡萄牙占领以来使巴西内地第一次沐浴文明的阳光，使巴西人迅速迈入现代社会。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通过流血的顽强斗争使